

1946—1948 年国民党中央政府与 北平地方政府物价调控矛盾初探^{*}

● 王 蕾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 要: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北平重新归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体系,但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却相当微妙。这种微妙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北平的经济生活与高物价的调控。其中特别是经费的拨给与使用、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与地方执行、物资“禁”与“放”、外汇放开与物资管制四方面的矛盾尤其显得突出,政府治理本身的利弊得失在客观上也使得北平物价形势进一步高涨。

关键词: 国民党中央政府;北平地方政府;物价调控;矛盾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465(2015)02-012-07

The Contradiction of KMT Central Government and Peking Local Government on Price Control during 1946—1948

WANG Lei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Anti Japanese War, Peking reclassified 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anagement syst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o delicate, that affected Peking economic life and high prices. The contradictions in fund allocation and usage, central macro-control policy and local implementation, prohibition and release of materials and opening-up foreign exchange and materials regulation were obvious. Pros and cons of government also pushed Peking further high price situation.

Key words: KMT central government; Peking local government; price control; contradiction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北平从日伪手中重归中央政府的管理体系,但在国民党中央的统盘规划中,抱有在经济上“偏枯北方”之心,而作为华北最重要的城市,北平尚有在中国历史上“故都”的特殊地位遗留的影响力发挥作用,“尤以近地方观念日深,畛域之见尤著”^①。因此在中央与地方关

系上相当微妙,这种微妙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北平的经济生活与高物价的调控。其中特别是经费的拨给、物资的来源与工商业贷款的严格限制方面,地方政府的抱怨尤多,这在客观上也使得北平物价形势进一步高涨。以下试分述之。

一、中央与地方在经费拨给与使

^{*} 收稿日期: 2014-12-10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调控五次物价波动的考察”(11000002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蕾(1978—),女,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 经济史。

用上的矛盾

在经费的拨给与使用方面,南京中央政府与北平地方政府之间互相推诿,地方政府希望能得到更多的中央财政补助以平抑物价和提高市民生活,而中央政府方面却又力图将负担下压给北平地方政府。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力普遍困乏的前提下,就北平市的地方财政而言,北平市政府在接收过程中即遭到中央各系统的“劫收”,有收益的单位收归北平市政府的本来就少,主要经济部门多掌握在官僚资本的手中,而物价高涨,首先是造成工商业的凋敝,各类可征税相应减少,地方财政收入难以增加,不得不依靠中央政府的补助。何思源在任市长一年后,就曾抱怨“平市财政困难,一年应付实已心力交瘁”^②。第二,市政府本身的支出庞大,因为物价的高涨,各类办公用品等的价格有升无降,日有增涨,极其盼望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援。但对于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而言,首要的任务是支付内战中的巨额军费,随着内战的长期化,财政日竭,更需要地方收入支付,中央推诿责任成为常态,再加上北平并非中央政府的核心利益区,因此在经费拨给上北平当局与中央政府是有矛盾的。以北平市的教育经费为例,由于教育行业的集中,北平的教育经费甚是巨大,地方收入向来不敷,抗战以前每月经费 7.3 万元,由中央补助 5 万元,略占 68%。1946 年 3 月物价暴涨,教职员待遇提高,当时的教育局长王季高呈告行政院实难维持,行政院准许按月补助 6 000 万元,6 月份起改拨 9 000 万元,10 月份起改拨 1.5 亿元。但这根本无法维持。北平市政府以 1947 年 11 月间物价增涨不已,待遇又将调整,预计明年度需费益发巨大等为由呈请行政院自 1947 年 1 月份起按月拨发教育补助费 3 亿元,这个要求未获行政院令准,并且行政院还要求将此项补助全部列入地方预算。同时,中央为了安定局面,又规定公教人员自 1947 年 12 月份起实行新待遇办法,1948 年 1 月份起即需按照上列款额全数补助,按照这个规定核算,北平市的教育经费每月计需 7 亿元。北平政府认为若按过去补助份额计算,中央应补助 4.76 亿元,但中央政府除 1947 年 12 月份拨给 1.5 亿外,尚差 3.26 亿元的巨额亏缺需北平市政府以地方收入支付。北平市政府因此不断呈请行政院拨付这部分资金。^③

事实上,当时北平市政府的拨付经费要求往

往被行政院以各种理由予以驳回或干脆不予回复。如北平市警察局暨附属各机关积欠 1946 年和 1947 年的电灯、电话、自来水费 2.4 亿元。北平市警察局与行政院并电交通部交涉,要求准予免收该项费用,但行政院仍命令需要筹缴。^④一些北平地方官员甚至不得不利用某些人的个人影响力来与中央沟通,以达到拨付经费的目的。如与蒋介石私交甚好的胡适在 1947 年 10 月 29 日前三个月内三次到南京,为北平市公教人员的补助发放充当了有力的说客,被王重民感激地称为“在最近三个月内,先生三次晋京,让公教人员们有吃有烧,暂得温饱,受其惠而感激先生者不仅重名一人,亦不止北大一校”。^⑤上文北平市教育补助款的中央拨付,王季高也写信给胡适说明具体情况,希望他“鼎力赞助,赐予分别转电主席及蒋秘书长准照所请”。^⑥甚至北平市长何思源 1947 年 7 月也曾就北平教育经费的增拨问题在未获准许后,在递交给蒋介石签呈的同时,又致函与他素有私交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说明“前呈请教育补助费未邀核准,市府拮据,无法挹注,如中央不增加补助,恐平市教育陷于停顿,或因此引起纠纷,前途非常危急”,要求他代为面呈。^⑦北平有许多民主人士。这些社会名流面对高物价的自身境遇与民生疾苦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一些民主人士则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利用各种机会争取中央政府对求援行为的默许。如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就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做了一些为民请命的事情。1948 年秋,国民党政府北平当局按照中央政府要求冻结了工资和物价的上涨。一般人的收入被限死,物资多被隐匿起来,一些日用必需品的黑市价格却天天飞涨,市民生活困苦不堪。康同璧趁着蒋介石夫妇视察北平的机会,约了几位女界代表面见总统夫妇,请求取消限价政策。当时,很多朋友都劝康同璧不要去激怒蒋介石,康同璧却坚持说“民众都活不下去了,有机会说话的人是应该去为民请命的。”^⑧1948 年 11 月,北平粮食日趋短缺,粮价却一路猛涨。为解决北平严重的粮食问题,康同璧联合北平的妇女界和各慈善团体,委托驻平美总领事代为转达美国政府,并致电罗斯福夫人,恳请迅速运送粮食接济北平市民。康同璧等人的呼吁在美国方面有了反应,大批美国粮食运到了大沽,只是由于时局变化,不能转运到北平。

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与地方执行的矛盾

抗战结束以降北平地方行政机构的不断变更,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与地方执行方面的矛盾。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之后,1928年6月,北京市改为北平特别市。北平在全国的行政位置发生了变化,成为地方性的大城市。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1946年9月1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北平行辕主管五省(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三市(北平、天津、青岛)的军事、政治,李宗仁由汉中行营主任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约在11月左右带领各处工作人员到北平,正式成立行营于中南海。^⑨但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抱怨蒋介石玩弄权术,中央调派人员等权力的运作过程不对他透露,连行辕直属机关的北平市政府市长何思源被调职他也不能提前得知。当时情形“主官无权,政出多门”^⑩,针对的就是中央多派党政军机关在北平。这些机关直属并直接听命于中央主管官署,并不服从北平地方政府的调遣。李宗仁形容自己在北平行营(行辕)的处境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⑪。1948年5月李宗仁当选民国副总统后辞去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职务,北平行辕随即撤销。1947年12月,蒋介石又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原保定、张家口两个绥靖公署合并而成,以傅作义为总司令。^⑫此外,在1946—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熊斌、何思源和刘瑶章先后任北平市长。第一任是熊斌,原为陕西省主席,任期自1945年底始;第二任是何思源,原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10月22日调任,11月1日到平上任,1948年7月1日被撤职,任期1年零8个月;第三任市长是刘瑶章,其任职直到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的政治情形与派系斗争复杂。如何思源在任时就与副市长张伯谨不和。张伯谨是三青团中央委员,与陈诚关系较好,本想接任熊斌为北平市长,但此职位为与陈果夫等人私交较好的何思源所得,张伯谨耿耿于怀,与何貌合神离,何也极力想要张调出北平。^⑬最终张伯谨被调离北平。而何思源也因为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等事不为蒋介石所喜,又久在地方任职,在中央没有强硬背

景,于1948年7月被撤职。^⑭中央政府对北平当政者用而疑之,北平市政府上下又各存私心,对此,何思源曾慨叹“北平环境复杂,人事错综,复值戡乱行宪,纠纷迭生”^⑮。这样的政府机构要治理好北平不可想象。这在客观上也影响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各部门间对经济的调控以及调控的力度与效率。加之,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屡次更迭,更不利于物价调控政策的连续性。

在中央宏观调控的地方执行方面,1947年2月和1948年8月两次自上而下的大规模价格管制运动中的地方执行是体现中央政府与北平地方政府关系的典型案例。紧缩通货与平抑物价是中央政府早就意识到但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作为纸币大量发行的决策者,中央政府面对这种状况,也试图运用各种手段来抑制物价的上涨,抑制住通货膨胀。早在1947年2月,监察委员何汉文等调查1946年上海黄金风潮案时就总结说“我国经过八年艰苦抗战,通货已演成恶性之膨胀,法币回笼乃为国家财政政策上之必要,同时物价指数业已高出战前数千倍乃至万倍。因是平抑物价,亦为安定经济从事建设之不二法门”^⑯。国民政府不断出台目标在于经济稳定发展的价格管制政策,一方面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采取通货紧缩政策,紧缩银根,抑制资金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保持民众信心,维系社会平稳。坚信各类措施“只要能得到政治力量的支持,各种控制办法是能有所作为的”^⑰。但是采取的手段大部分不尊重客观的市场经济规律,治标不治本,在此错误信念的指导下,再精巧的具体经济措施也最终会归于失败。如在金圆券改换法币之后,虽然“币”的名称改变了,但国民政府以发行纸币作为弥补财政开支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北平地方政府对此状况无能为力,只能在中央制订的政策框架下做一些微调。对一些不切实际的苛刻的中央政策,北平市政府为了地方治安和行政的正常运转,只是做了一些蜻蜓点水式的动作。北平当局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市场信心,使得市场不至于崩溃。

1948年“八一九”限价令中央对地方的执行要求较严格,而北平地方政府则有所选择,或严苛或较为放松。如中央规定除金圆券外,使用任何其他货币的人都要被处以重刑。^⑱但实际上北平“所有的老百姓都继续使用不合法的银元和同样非法的美元”。^⑲在北平市政府会议上甚至有人公

开提出“本市煤油供应,向由外商经营,现在存量极少,如控制过严,诚恐影响来源,益感匮乏,拟除洽请外商增加供应及禁止输出外,暂不制订管理办法。”^②这与蒋经国的上海限价初期的雷厉风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个这样的故事,1948年10月,当蒋介石最后一次视察北平,从机场乘汽车穿过市区时,看见人们在许多地方排着长队,他询问人们为什么排队,一位当地官员谎称人们等着把手中的银元和美元兑换成金圆券。实际上,人们是为领到他们被拖欠的工资,而工资由政府官员以一袋袋面粉的形式发放,这无疑是违反中央法规的。作者慨叹蒋介石被蒙蔽得如此严实,以致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竟然提到街头的这一幕,使他有理由相信并赞扬北平市民的爱国精神。^③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中央严厉的财政经济措施在北平的实施力度却比较温和,在时间上也比较短暂。

与此同时,北平市政府对中央一些惠及地方的举措则积极予以配合,并尽力在中央政策的框架下谋求最大利益。日本投降后,北平的物价由北平市社会局通过北平市商会管理委员会管理。1947年,由北平市社会局、北平行辕、市参议会、各业公会共同组成物价评议会。其价格执行情况由社会局、市党部、警察局、警备司令部联合组成经济检查组负责。1948年4月,北平由市商会、各同业公会、总工会、农会、互助会、社建会、保甲联谊会共同成立北平反加价委员会。8月19日,国民政府紧急命令“币制改革”,北平市随即由社会局、财政局、公用局、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宪兵19团、市商会、市工会、特别庭组成北平市经济管制会,负责物价管制策划、取缔投机倒把、囤积非法经营之策划、金融管理之策划等。11月11日,北平市政府又组织社会局、警察局、商会成立核本定价委员会。^④1947年南京政府曾表示为谋各业业务健全发展,对北平市业已依法登记之生产合作社雕漆、针织、粉丝、化学、铜线、锣底、牛羊乳等所有社员普遍惠予无息贷款及赈济面粉。北平市社会局立即以“殆为本市失业或具有特种工艺技能之贫困工人,良以劳力有余而资金则短绌不敷周转”^⑤为由,申请这些优惠也施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冀热平津专员办事处组织中的电业器材、珐琅、雕漆,以及针织、缝纫、毛巾、印刷等还在申请登记中的生产合作社,按社员数平均赈济面粉,以

“扶助各社业务均衡发展,而利合作事业之推进”。^⑥

三、物资“禁”与“放”的矛盾

在中央政府与北平地方政府的矛盾中,粮禁开放之争关系到平津两地普通市民的基本生活。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中央政府粮食部限制物资北运,设置外运转口限制。如汉口等地的小麦进京必须颁发许可证,核准数额后方能起运。如果粮商私自运输,就属于搅乱南方市场的偷运行为。上海市市长吴国祯就曾称“禁止食米运往北方。政府早有明文规定,不意竟有北洋帮频频以米粮偷运北方……故市府亦已呈请中央严格执行经济紧急措置办法,查禁偷运。”^⑦在市场经济中商人原本正常的根据各地资源禀赋的不同,将商品从低价地区运往高价地区以逐利行为成为犯罪!粮禁政策使得北平的面粉制造厂在战后无充足的小麦作为原料,并且,粮商已在上海采购并付有定金的小麦也常常因为转口证未能及时发放而不能起运。中央政府的人为限制政策在买卖双方之间造成许多不便。外埠的粮商由上海购面粉运到北平以牟利者更因为手续的繁琐,货物的不安全而日益减少。更有甚者,中央政府在施行禁止南粮北运政策的同时并无能力保证对北平的其他粮源来地西北、东北交通渠道的畅通,北方粮食也无法从秦皇岛转运北平。这两大原因导致的市场后果便是粮商、面粉制造商储存货物之风日烈,惜货不售成为常态,市场供需大为失衡。北平粮食价格得不到有效缓和,北平与产粮区的价格相差甚巨,许多面粉厂只得部分停工。^⑧这种状况引起了北平粮商的强烈不满与焦虑,在要求开放粮禁、允许大量小麦运平供给制粉不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只得一面请市政府转请粮食部速发转口证,一面与津市粮商采取同一步骤,请招商局速将天津港冻冰解封以利运输,否则请当局确保津市秦皇岛间铁路畅通。^⑨

更为不利北平物资调控的是,中央政府对美国援助的发放与分配也在“南粮”的限制范围。北平地方政府与粮食部再三交涉,才能得到一些相对于北平庞大的城市人口而言数量十分微小的运输。1948年1月,北平市社会局便抱怨“本局以近日本市限价飞涨,影响市民生活至巨,虽曾再四向中央请求准许南粮北运,每次运到不过数万袋,对本市一百七十余万人口之都市,直如杯水车

薪,难收平抑之效”。^{②③}在全国的物资供应均不足而各地又各有军阀的情况下,由于上海是距离首都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外舆论所系,政府进行物价平抑的着力十分充分;北平归属蒋介石不信任的桂系李宗仁为主任的北平行辕掌管,中央对北平地方心生猜忌,统一、高效率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经济政策的交流沟通难以形成。尤其是粮食分配上的对比更为明显,北平政府官员对中央的分配不均与地区歧视政策甚为恼火,心生怨言,并利用中央对北平政府索要物资行为的拖延推搪,为自己辩护并安抚群众,言论中打着区域诉求的烙印。如在报纸上声明“该局为求彻底解决本市粮荒,日前特电粮食部及央行张总裁,速运面粉二百万袋来平,尚未奉到复电,闻天津市亦有同样请求。并派专人赴京洽办。此批面粉北运后,平津食粮价格必将大跌”、“据平市某大粉商称:近接汉口某大粉厂来电:三十六年十二月份汉口面粉外运转口限制,业经粮部核准为汉粉二十万袋,日内许可颁下,即可北运平津”^{②④},此等说法在当时随处可见。

驻北平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对傅作义并无绝对权威,在华北无人可依托,急需依赖之际,所采取的方法只能是协商安抚使之卖命,凡所要求,尽力答应,不顾给北平地方经济造成的压力和严重后果。比如说各色银元在1935年就被国民政府禁止流通,限时兑为法币,退出了流通领域。抗战之后,北平的货币体系已被中央政府通过兑换法币的手段使之成为全国货币体系的一部分,但在北平货币市场上1948年12月后却出现了大量银元充斥市场的现象。其中1915年袁世凯当政时期铸发的银元(俗称“袁大头”,含纯银6钱4分零8毫)因含银量高成为市场商民广受欢迎和信赖的硬通货,这些银元大大扰乱了北平的货币体系的稳定与管理。而银元流出加入到流通领域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傅作义守军部队,原因是蒋介石为了让傅作义的部队坚持守城,不顾北平地方货币流通领域的稳定性,答应了部队每天以“袁大头”为关饷的要求而罔顾北平地方货币体系的稳定。^⑤既然“袁大头”得到中央允许成为流通货币,数目巨大的如船洋^⑥等其他含银量各异的银元也就得以从各种渠道公开,堂而皇之的得到流通合法性,因此北平的货币种类变得相当杂乱,十分不利于地方政府进

行收付管理。货币与金融的流通过程复杂而充满变化,其不稳定性正存在于市场运行和货币当局对这些运行的宏观调控中。南京中央政府的行为逾越货币当局的管理权限,只顾当权者的政治利益,不顾在地方上可能引起的市场后果与管理困难。这种心态与作为成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无法解决的内在缺陷,越是精密细致的安排越是不可避免的带有最终失败的悲剧色彩。

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的负增长与工商业的快速衰退,北平市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无力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调度,连作为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基础设施都无法保证,能源、供水、道路和社会服务的成本不断攀高,政府财力捉襟见肘。为此,政府实行了精简机构以减少开支等举措,但这些作为对亟待解决的城市任务而言却是杯水车薪。

四、外汇放开与物资管制的矛盾

抗日战争之后的中华民国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但松散的区域整合在抗战时期日伪地区各自为政尚未整肃的情况下显得益发松散,混乱的接收情形又进一步加重了中央与地方的离心。特别是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偏枯北方”的政策,即并未首先调整解决收复了的广大北方地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是采取保全首都及南方大城市的策略,在全国物资均呈紧缺状态的形势下,在许多与物价紧密关联的经济问题上不顾北平地方当局的呼声与北平居民的生活困难,造成了中央与地方事关民生的许多矛盾,最终使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北平物价跳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运输阻塞使物资在各城市间的分配不均。在政府无力组织有效货运的情况下,政府对民众自行货运的任何行动不仅不应加以限制,而且应该加以一切可能之奖励支助。但北平市当局虽积极组织政府采购,但对物流的民间组织并不热心疏导,这无疑是组织上的不周。当时报章在分析时认为“粮贷虽由三行两局储款以待,但粮商多裹足不前,不敢问津,故等于无有,最低届至现在粮贷对平市食粮疏导上,尚未发生若何作用”^⑦。“偏枯北方”的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在原料、外汇与资金上偏向和支持上海等江南各城市,有意识地限制北方经济的发展。如在外汇方面,胜利后人们热切盼望中的国际贸易的繁华景象并未到来。北平传统上较有优势的国际贸易虽有较大恢复,但大宗贸易“仍多为江南

大埠商人与豪门夺去”^③。具体体现在抗战胜利初期,北平开有数十家贸易行,北方外汇却迟迟不放开。北平的国际贸易不能独立操作进行,而要通过上海商人代做,使得北平的这些贸易行不得不兼营其他业务,无法将国际贸易作为主业。外汇放开之后,各工商业向国有银行申请手续繁杂,不仅缓不济急,而且中央给予北方的外汇数额又极少,且很难得到。1947 年第一季度平、津、秦皇岛三地核予外汇数额只占全国的 4.5%,北平贸易业日趋衰微,只得改为国内贸易或兼营其他业务。但上海却在 1946 年底“政府既决定对沪上各工厂发放生产贷款,挽救危机,但无通盘妥善办法,突予实惠,而绝不问发放后之结果。当时核准者共三百一十五家,贷款共六百五十五亿余元,市场骤增此巨量法币,一旦不事生产,迥异用途,徒增游资作祟之害甚多,厂家如大中华造纸厂、正泰橡胶厂、中国生化制药厂等,皆利用贷款购金”。^④外汇政策上的不平等引起北平地方政府与工商业者的强烈不满,担忧“上海动力燃料及工资水准,已较北平为高,而北平因原料及资金之限制,不能自行生产,所以北平各种日用必需品价格,因成本大而较其他各大城市昂贵。长此以往将形成北平经济偏枯之形势”^⑤。物资管制方面尤其如此,如在棉纺织行业,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物资,作为原料供应的棉花都由政府实行统购,民营棉纺织厂只能实行代纺代织。原料的生产到销售,全部被政府牢牢控制,民营棉纺织厂陷入困境。而北平周围的棉花还要由中央统一采购分配。中央政府对南北两大经济区域的不均衡政策使得北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深怀不满,对其产生离心心理。

总之,将北平的物价上涨及其调控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具体到 1946—1948 年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北平地方政府关系的历史情境中去,耐人寻味。南京中央政府和北平市政府解决物价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实际效果并不如执政者预想的良好,物价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日趋上涨。看似科学的政府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价问题。北平地方政府进行的这些平抑物价活动,虽然能暂时弥合一些民生缺口,但最终或只停留于立法活动的层面,或在实行的过程中效力被消解。有些措施本身即存在明显漏洞,有些则是在措施实施过程中管理方面的缺陷使然。最主要的是,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由此使得政府

治理本身的弊端得以放大,种种经济政策必然适得其反。

注 释:

①左双文整理《1946—1948 年何思源与朱家骅往来函电选编》,《北京档案史料》2005 年第 3 期,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第 162 页。

②左双文整理《1946—1948 年何思源与朱家骅往来函电选编》,《北京档案史料》2005 年第 3 期,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第 157 页。

③《王季高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307、308 页。

④《北平市政府第五十次市政会议决议录(1947 年 11 月 14 日)》,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历届市政府会议决议录》,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8 年,第 653 页。

⑤《王重民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255 页。

⑥《王季高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308 页。

⑦左双文整理《1946—1948 年何思源与朱家骅往来函电选编》,《北京档案史料》2005 年第 3 期,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第 156 页。

⑧《访康同壁先生》,《平明日报》1949 年 1 月 6 日第 2 版。

⑨赵晋《解放前夕北平的辖区及国民党政权机关》,《北京党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

⑩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642 页。

⑪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654 页。

⑫赵晋《解放前夕北平的辖区及国民党政权机关》,《北京党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

⑬王强、马亮宽《宦海沉浮一书生——何思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219、223 页。

⑭万永光《我所知道的何思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 18 辑,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3 年,第 47 页。

⑮左双文整理《1946—1948 年何思源与朱家骅往来函电选编》,《北京档案史料》2005 年第 3 期,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第 162 页。

⑯《监察委员何汉文等调查 1946 年上海黄金风潮案史料》,《民国档案》2000 年第 3 期,第 36 页。

⑰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 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第 236 页。

⑱工商新闻社编《首都物价手册》,南京:工商新闻社 1948 年,第 3 页。

①(澳)C. P. 菲茨杰拉德著, 郇忠、李尧译《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第236页。

②《北平市政府第八十三次市政会议决议录(1948年12月10日)》,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历届市政府会议决议录》,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 第738页。

③(澳)C. P. 菲茨杰拉德著, 郇忠、李尧译《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第236、237页。

④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物价志》, 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5年, 第12、13页。

⑤⑥《社会局关于对本市所有生产合作社普遍惠予无息贷款及账济面粉以扶助业务发展给善后救济分署的公函》(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 北京档案馆馆藏档案 档号 J002-005-00144。

⑦《主要物价突起涨风, 当局积极设法镇定》, 《申报》1947年4月8日第6版。

⑧⑨⑩⑪⑫《平社会局电请粮食部, 速运面粉二百万袋》, 《世界日报》1948年1月3日第3版。

⑬(澳)C. P. 菲茨杰拉德著, 郇忠、李尧译《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第241页。

⑭船洋指的是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发行的银元, 成色为银88, 铜12, 即纯银为23.493448克, 因背面有两帆船图案而得名。参见: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金融志》, 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1年, 第36页。

⑮⑯孙树宏选编《北平工商业概况(三)》, 《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 第33页; 孙树宏选编《北平工商业概况(一)》, 《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4期, 第55页。

⑰《监察委员何汉文等调查1946年上海黄金风潮案史料》, 《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 第37页。

(责任编辑: 张贡生)

(上接第11页)

会局1932年印, 第417页。

⑲北京市档案馆《五金业营业状况报告书及会员异动》档号087-023-00007, 1935年。

⑳北京市档案馆《五金业会员名册及异动》档号087-023-00004, 1933年。

㉑北京市档案馆《五金业营业状况报告书及会员异动》档号087-023-00007, 1935年。

㉒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缘带业、五金业等公会关于商号歇业、退会的函(附: 入会凭单)》档号J71-1-13, 1937年。

㉓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0年, 第26~27页。

㉔北京市档案馆《关于北京市私营五金业历史演变的调查情况》档号87-23-90, 1956年9月25日。

㉕刘俊峰、张艳国《同业公会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光明日报》2008年4月13日。

㉖《直省商联合会电请取消特种物捐, 建商反对两种特捐》, 《世界日报》1927年4月4日。(注: 凡本文所引《世界日报》各年相关资料皆是自《世界日报全文检索系统》中查询而得, 互联网址: icd.shu.edu.tw/search2/index.php, 访问日期: 2009年8~10月)

㉗《北平商会昨日向蒋中正请愿》, 《世界日报》1929

年7月9日。

㉘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1947)》, 《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

㉙《昨日总商会开第二次常会, 议决事项七件》, 《世界日报》1927年5月3日。

㉚刘俊峰、张艳国《同业公会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光明日报》2008年4月13日。

㉛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0年, 第188页。

㉜《北平百行商会入股市民银行》, 《世界日报》1928年9月8日。

㉝北京市档案馆《磁业、五金业、服装业等日业公会和大阪府立贸易馆天津分馆等为调查商号情况及推销商品等与北京商会的来往函》档号J071-001-00067, 1938年。

㉞刘俊峰、张艳国《同业公会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光明日报》2008年4月13日。

㉟《总商会昨又讨论暑热急救事宜》, 《晨报》1927年7月27日。

(责任编辑: 郑俊义)